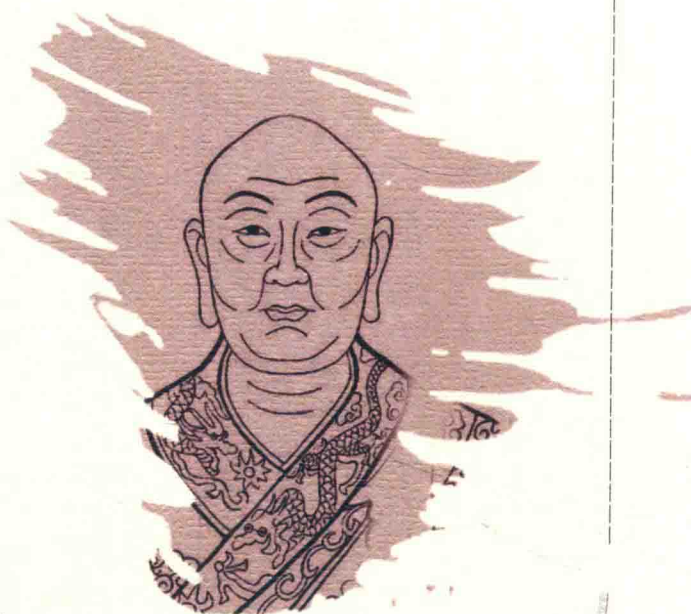


何江海 著

广孝德全始终，行通神明，功存社稷，泽被后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时，以辅佐兴王之运，则亦安得播声光于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



姚广孝

Yao Guangxiao

大家精微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姚广孝

何江海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6N15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广孝/何江海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7342-2

I. ①姚… II. ①何… III. ①姚广孝(1335—1418)—传记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9250号

姚广孝 YAO GUAGNXIAO

何江海 著

责任编辑 郑若萍 彭 燕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7342-2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前言 / 001

第1章 姚广孝生平 / 003

一、乱世贫家 少小异志 / 003

二、弃儒从释 交游天下 / 012

三、壮士暮年 远赴北平 / 025

四、靖难师起 居功至伟 / 038

五、荣归故里 老当益壮 / 055

六、生前身后 功过任说 / 069

第2章 姚广孝的文学成就 / 080

一、著作概述 / 080

二、诗文内容 / 085

三、风格特色 / 100

四、以文观人 / 110

第3章 姚广孝的学术思想 / 120

一、姚广孝的净土思想 / 120

二、护教之作《道余录》 / 130

附录

年谱 / 151

主要著作 / 153

前言

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历朝历代的高僧多有传记。这些著名僧人或是严持戒律，或是精研佛法，或是博闻广识，种种嘉德懿行，不一而足，基本上都给人以淡泊名利、不问俗事的正统僧人形象的印象。不过也有例外，南朝刘宋文帝时就有这样的人物：“时慧琳者，以才学得幸于帝，与决政事，时号黑衣宰相。”如慧琳这般，积极参与政治并影响较大、贵极人臣的僧人，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也不过寥寥数人，另有两位分别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刘秉忠和元末明初时的姚广孝。

作为中国历史上三大著名“黑衣宰相”中的殿后人物，姚广孝无论在宗教还是政治上都颇有建树。一方面，姚广孝纵使身居高位亦缁衣斋行，始终保持着僧人的基本操守，其所撰写的《净土简要录》《道余录》等著述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在“靖难之役”这个直接改变明朝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姚广孝作为燕王朱棣最为倚重的心腹谋臣，先机襄赞，居中谋划，辅佐朱棣奠定胜局，班列“靖难”功臣之首。但其才能并未局限于此。姚广孝不仅博通儒、释、道三教，在文学上也造诣颇深，“善诗词古文”，明初第一诗人高启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姚广孝还设计

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隔声建筑，主持监修完成了《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负责督造永乐大钟等。这些事功成就，即便达成其中任何一项已足以留名后世，而姚广孝却能数者兼具，胜任自如，其才能不由令人叹为观止。

只是，透过这些事功成就，追寻姚广孝的生平足迹时，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与彷徨的身影。姚广孝的成功，不单单来自他的学识才干，更重要的是他的坚持，但这种坚持放在姚广孝身上本来就是一个矛盾。他坚持着少时“仕于王朝，显荣父母”的梦想，却又始终坚守着僧人的基本操守和本分。他向往着归依青山的隐者之乐，却又难以割舍立功立名的士者之心。他当了一辈子慈悲为怀的僧人，却积极策划推动了战争，不自觉地缔造了一个戾气深重的时代。他因好友之死而反感于朱元璋的残忍嗜杀，却又没有与之决裂的意思，也无力改变朱棣的决定。

或许，这样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无法避免。在姚广孝少时为自己所作的人生规划中，“读书有成则仕于王朝，不成则为方外之乐”，似乎就已经预示了他互逃于儒释之间的境况。复杂的人性与难测的命运，决定了姚广孝这看似悖论却又真实的传奇人生。

第 1 章

姚广孝生平

一、乱世贫家 少小异志

世为医家

关于姚广孝的家世，一般史籍记载较少，如《明史》中仅提及他为“长洲人，本医家子”。明成祖朱棣所亲笔撰写的《御制荣国公神道碑》则略有追溯：“广孝，苏之长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积善，母费氏。”

相对较为详细的记载，还是来自姚广孝本人。永乐十年（1412），姚广孝荣归故里，在其少时出家的妙智庵内建立姚氏祠堂，并立碑为记。碑文由姚广孝亲书，名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后收录于姚广孝《逃虚子集补遗》中。此碑于民国年间尚存，当地《相城小志》亦收录于卷，名为《姚少师祠堂记》。虽然因相去五百多年，久历风雨，以致移录中出现了较多空白、错漏与讹误。但以两者相互印证对照，大体无差，无疑是关于姚广孝生平最重要、最详细的第一手资料。

综合相关记载材料，我们能够较为明确地整理出姚广孝上

三代家庭成员的大致情况。朱棣于《御制荣国公神道碑》中称姚广孝之祖父为“菊山”，由于古人看重名、字之别，并以称人字号为尊，因此这只能是姚广孝祖父的字或号。其祖配偶为周氏，生有二子，长子为姚震之，即姚广孝的伯父；次子为姚震卿，字妙心，即姚广孝的父亲，配费氏。此外，姚广孝还有一个续承家业的哥哥姚恒，和一个嫁与邻村高家的姐姐高姚氏。

关于姚家先辈的生存状况，在姚广孝的自述中也有所提及。其先祖于北宋时还是中原汴梁人氏，但世为平民，家境寒微，并无什么功名富贵之士。金兵攻破汴京之时，其先祖为躲避战乱，不得已带着妻子儿女背井离乡，南渡长江，一路来到平江府（明改为苏州府）辖下的长洲县，之后在长洲相城（今苏州相城区）定居下来。逃难千里的姚氏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既无土地产业，又无依无靠，更无权无势，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据姚广孝所述，至少到了其祖父时，已正式以医为业，其哥哥姚恒后来也“续祖、父箕裘之业”，即与其祖、其父一样行医为生。因此，后世记载中强调姚家为“世业医”，称姚广孝“本医家子”的说法，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不过这种记载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姚广孝出身富贵，后世笔记小说中也确实有过这样的演绎。事实上，尽管比起佃地求生的农民，医者的社会地位略高，挣钱也或许稍微轻松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姚家长期困顿的处境。无论姚广孝的自述，还是其他史料文献，都找不到关于姚家上辈医术的只言片语，却有朱棣在姚广孝逝后召见其子侄辈，发现姚恒的两个儿子已成了愚笃特甚的农夫，不再行医的记载。由此或可推测，姚家上辈不过是凭着自己的摸索，掌握些粗浅的医术，赖以养家罢了，于当地还算不上家学渊源、医术高明的名望宿医。因此直到姚广孝的祖、

父两代，也还只是在相城租房而居。姚广孝为此发出“无寸田尺土，生计甚疏”之叹，可见当时家中经济状况并不太好。

在姚广孝的自述中，提及相城地势低洼，水环其廓，当地人多以耕渔为业，死者无地安葬，只能“火焚骨殖沉之水”。尽管是“其例皆然”，但如此做法大抵只是穷苦人家节省丧葬费用的应对之策。姚家一直遵循着这一当地习俗，不建坟墓，直到姚广孝荣归故里后才建起祠堂。对于从中原逃难至此的姚家而言，迫于“无寸田尺土”的窘困而不得不如此，其无奈、悲痛之情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由上所述，可知姚广孝的家庭不过是温饱之上水准的普通医家而已，没有太多的经济依靠，谈不上什么世家学风，于当地的名望也只是因“世事佛积善”而为乡人所敬。这样的家境，对想要出人头地的姚广孝来说难以起到太大的支持作用，这应当就是姚广孝选择出家为僧的重要因素之一。

生逢乱世

“姚广孝”之名，并非其原名。其幼年在家时，名为“天禧”；十四岁出家为僧后，改法名为“道衍”，字“斯道”。靖难之役功成后明成祖朱棣将其“召至京师，命易今名”，即御赐其名为姚广孝，为后世所常用。

姚广孝的具体出生年月，虽无明确记载，但可依据相关史料推断出来。《明史》《御制荣国公神道碑》都记载了姚广孝逝于永乐十六年（1418），享年八十四岁。另据姚广孝的自述，永乐二年（1404）时他“年已七十”。按传统虚岁纪年的习惯来推算，均可确定姚广孝出生于公元1335年，这一年一般记为元顺帝至元元年。

元顺帝是元代的亡国之君，至元元年其实已是他在位的第三年。一般认为，此时恰好处于元朝步入衰落的开端，“其乱

之成，实自顺帝”。此时虽离元朝灭亡还有三十几年，但全国局势已是积弊已久，矛盾激化，元朝统治的败象在社会各个方面呈现出来并逐步恶化。这一年，元顺帝也才虚岁十六，根基未牢。把握朝政的右丞相伯颜采取排挤汉人的政策，迫使元顺帝禁止汉人参政，废除科举，甚至不许汉人学习蒙古语。这些做法无疑加深了汉蒙两族的不和，使得民众失去对朝廷的信心，元朝的统治基础更加动摇。

在姚广孝五岁时的至元五年，夺回朝政大权的元顺帝试图革新政治，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次年，也就是至正元年（1341），全国出现了三百多处公开骚乱。至正四年，很多地方遭遇特大饥荒，民不聊生，盗贼群起。至正五年，一首预示天下大变的童谣传诵于淮楚之间，弄得人心惶惶。姚广孝的童年就是在这样流言四起、乱象频现的动荡年代中度过的。至正八年，十四岁的姚广孝入寺为小沙弥，当时，方国珍浙东起兵，数降数叛，割据一方，由此揭开了元末大动乱的序幕，群雄争斗、改朝换代已是呼之欲出。

至正十一年，由于元廷滥发纸钞、黄河重灾和治河苛役等直接原因，颍州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所领导的白莲教众红巾起事，并迅速发展扩大，“延至江淮，殆无完郡”。至正十二年，朱元璋还俗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义军。而这一年，十八岁的姚广孝正式剃度出家。一进一出寺门的两个和尚，都改变了历史走向，成为明初重要历史人物，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机缘巧合。

至正十三年，张士诚起兵于泰州，建立大周政权，逐渐发展到江浙一带，于至正十六年兵不血刃占据了平江府城（今苏州平江）并定都于此。此时，朱元璋也攻下了集庆、镇江等地，与张士诚割据地接壤。朱元璋试图遣使通好，但张士诚未予理睬。两军发生矛盾，兵戎相见，大小数百战，反复较量长

达十二年，直至至正二十七年平江被朱元璋围陷，张士诚最终灭亡。这段时期的绵延战乱，对于长期留居苏州相城的姚广孝来说，有着直接的影响。他亲身感受到战乱对于民间生产、生活的严重破坏。

幸运的是，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围攻平江之役前，主战场基本上处于江南平原的外围，苏州一带作为张士诚控制下的中心地区一直没有直接遭受战火的破坏。在当时全国整体上已是遍布战火的情况下，三吴地带如同飓风的中心，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很长时间内仍然保持了相对的安定，可谓乱世中的乐土。这份安定，不仅维系了苏州自唐末以来生产发展、经济繁盛的江南核心地位，而且延续了当地文化繁荣、人文浓郁的氛围。姚广孝一家自南迁以来，一直生活在距离苏州府城四十多里的相城镇内。相城其地人口稠密，兼之地处苏州东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商旅往来频繁，孕育出浓厚的工商业和文化氛围，成为苏州近郊发达繁荣的重要市镇。这份繁荣于乱世战火中伴随着姚广孝平稳安定地成长，对其人生抉择与走向，无疑产生了很大影响。

幼年习儒

姚广孝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种周边动荡而本地始终相对安宁的氛围中度过的。姚广孝很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智，这既与苏州本地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关，也受其家庭世为医家的影响。要行医为业，基本的识文断字是必需的，而且还要经常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无论对见识还是心态都有所要求，这些无疑会给幼年的姚广孝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后人称赞姚广孝“博学多通，才智绝人”，疑惑“其术不知何人所授”，事实上应当是姚广孝不断努力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幼年所接受的儒学启蒙教育。

姚广孝少时习儒的经历，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姚广孝晚年自跋画像诗中曾说：“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东鲁书”指以山东孔孟为主的儒家典籍，“西方教”则为来自天竺的佛家学说，这显然说的是自己早年求学儒家，后来才身入佛门。另一首《奉酬王右史蕴德》中，姚广孝又说自己：“少时事孔学，长日游儒林……无成即从佛，净业乃所任。”姚广孝自小结识的好友高启在《答衍师见赠》中也说：“衍师本儒生，眉骨甚疏峭。”明确点出其曾经的“儒生”身份，高启更在后文中铺陈描述姚广孝学习时的情景。另一位好友王彝则在《衍师文稿序》中说：“师，儒林之出也，而托迹于浮屠之间。”这些记载，都明确指出姚广孝在出家为僧之前就习儒学的经历。

晚年的姚广孝，曾应幼年受教先生之子孟熙邀请，作有《题孟氏世系图》一文，提到其小时候的学校生活，自称“髫岁时”即童年七八岁时入学。同里的同学有三十多人，可见其入读的不是人数较少的私学，而是较为正规的乡学或社学。在《诸上善人咏序》中，姚广孝又提到：“衍不敏，早入教庠中。”所谓“庠”，其本意是老人养老的地方，也是老人教育下一代的地方，后来逐渐演变为地方所办的乡学，是中国古代正规儒家教育机构之一。自西周以来，儒家学校就有国学乡学之别，又有小学大学之分。至元代时官学更为完备，在路、府、州、县四级均设置相应学校，要求“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并规定十五岁以下者入小学。此外还颁令各路，普及社学：“诸县所属村庄，五十家为一社……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

由于姚广孝少时聪颖伶俐，“不烦师谕，义理自通”，很受授课老师的喜爱，故将其家世渊源告知姚广孝。这位老师姓孟，号材翁，颇有来历，是北宋信安郡王孟忠厚的六世裔孙。

其先祖孟忠厚为孟子四十七代孙，又是北宋哲宗孟皇后的侄子，家世显赫，于靖康二年携孟太后诏令，册立赵构为帝，深受南宋高宗信任，官至宰相、少师。孟忠厚的七个儿子亦都定居江南，繁衍为著族。这位孟先生可能就出自定居吴县的第六子孟雍或第七子孟载的其中一脉。

因为姚广孝十四岁就已出家，他接受儒学教育的时间最多也就不过六七年，很难说能学习、专研儒家典籍到何种程度。就一般情况来看，元代小学的授课内容基本上是“四书”与“五经”并列。在有限的六七年时间里，姚广孝大概只能得到些皮毛，对于其一生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通过这种较为正统的儒家教育，姚广孝有了初步的儒学基础，早早展示出“性早慧，通儒书”“读书，能诗文”的特质，对其后来的成长发展必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个影响不仅仅是学识上的，更表现在其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上面。

姚广孝自述：“广孝尚幼，不愿习医，而白父曰：‘某不乐于医，但欲读书为学，有成则仕于王朝，显荣父母，不就则从佛，为方外之乐。’”由此可见，很可能在少时习儒期间，因成绩优异而深得老师器重，并深受儒家建功立业思想的影响，姚广孝由此萌发了“学而优则仕”，从而显荣父母、光耀门庭的梦想。这一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可以说贯穿于姚广孝的整个人生，即使他当了将近一辈子的和尚也从未改变。

不甘平庸

姚家自迁来相城，家境一直未能有太大的起色，也就没有多少出身之路可以选择。出生于贫寒人家的子弟，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仕途显达，而是如何谋生。姚家当初之所以让姚广孝接受儒家的启蒙教育，除了受当地乡学普及程度影响，或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行医治病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但若

要满足姚广孝继续读书求学的强烈欲望，家中财力未必支撑得下去。因此家中长辈不得不从自身家庭状况考虑，劝说姚广孝放弃不切实际的奢望，要求姚广孝弃儒学医，像他哥哥姚恒一样续承祖、父的业医生涯，习得一技之长以减轻家中生活压力。

家庭的这一安排，无疑打破了姚广孝试图沿着传统儒学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希望。没有家庭经济上的支持，即使满腹才华，十四岁的姚广孝也难以仅靠自身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即便如此，已然在儒学熏陶中树立了远大志向、抱负的姚广孝也不甘屈从于现实的制约，始终坚持不再继承祖业，反而出人意料地作出出家为僧的抉择。对于尚未成年的姚广孝而言，敢于突破家庭的局限和束缚，作出这样的抉择，无疑是需要过人的勇气和见识的。

姚广孝的这一抉择，或许不无赌气的成分，但绝非简单的一时冲动，而是他经过认真思考后所想出的一个似可两全的办法：在不给自家增添负担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求学之志。深入考察姚广孝的成长历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后，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想法。

相城一带属于三吴富庶之地，自古以来就具有浓厚的宗教人文氛围，历代盛传“吴俗佞佛”的说法。地方志中有说：“吴中多佛老之区。”姚广孝的至交高启也称：“夫吴之佛庐最盛，丛林招提，据城郭之要坊、占山水之灵壤者数十百区。”可见当地佛教之盛。姚广孝的先辈流离于乱世之际，命运多舛，生活艰难，更需要精神上的寄托，因而“世事佛积善，乡之人皆敬焉”。如此社会和家庭环境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姚广孝，在耳濡目染之下，自然而然会对佛、道两教产生直观的认识和朴素的情感。这无疑会对姚广孝选择出家的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元代统治者推行兼容并包、自由放任的宗教政策，尊崇喇嘛僧人，使得宗教势力大增。尽管历代以来都设有僧道官制以掌理其事，却都没有元代那么高的地位。不仅品秩上达到了从一品、从二品，还拥有政治、军事、外交大权，甚至能够上干朝政，下治民事，成为政治上的特殊阶级。就连一般的宗教人士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拥有专门的户籍并享受免税免役的特权。这对有才能而出身低贱的人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一旦置身其中就能够分享到某种程度的士大夫生活。可见，元代中后期寺院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足以为姚广孝实现自己的大志提供潜在的机会，令不甘平庸的姚广孝坚持选择如此的道路。据此，后世明清笔记对姚广孝出家从佛的原因加以渲染，说他少时曾入府城，看到僧官“驺从之盛”，好不风光，遂感叹“僧亦富贵如此邪！”心中羡慕，遂生出家之念。这种说法或许有演绎夸张之处，却也未尝不是当时姚广孝心中所想。

对于姚广孝来说，出家入寺的最直接好处就是可使自己免受衣食奔波之累，而实际上他更为看重的是为自己争取一个能够继续接受教育的良好环境。事实上，自佛教寺院兴建以来，一直发挥着作为世俗学术和教育机构的文化功能。元代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文化发达地区，大批文人学士流连于寺院宫观之间，或谈玄论道，或交游唱和，都与佛、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有名的僧人、道士也多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儒、释、道三者融会相通，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这无疑也是影响姚广孝作出抉择的重要因素。

十四岁的姚广孝就能深谋远虑，坚持己见，想方设法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作出切合实际的选择，实属难能可贵。出家为僧，成为姚广孝人生发展道路上极为关键的一步。这使他没有辜负自己的过人才智，成长为博通三教的高僧，并借此获得接